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

曹仲彬 戴茂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 —



国防大学 2 045 1508 8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

曹仲彬 戴茂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马月乔
封面设计：张洪昌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3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207-00775-2/k·65 定价：1.90元

序　　言

曹仲彬、戴茂林同志搜集和研究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个人回忆与访问材料和文献资料，写成了这本《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这对研究中共党史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1925年到1930年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史情况，反映了国共合作、国共分裂、联共党内斗争和中共内部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况。它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很不寻常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政治思想的由来并提供了深究这个“左”的根源的线索。这本书还描写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教条小集团的形成与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经过。

中山大学建立于1925年，正值国共合作的时期。共产国际为了培养中国革命干部，办了这所大学。党的许多领导干部有不少在这个学校里学习过，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在理论方面，传播马列主义起了不能磨灭的作用。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斗争的消极方面及王明宗派小集团给革命带来破坏的后果而否定其积极的一面。这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必须认识的一个问题。

王明宗派小集团的成员回国以后，陆续分化，有的成了无耻的叛徒，如李竹声、盛忠亮（即盛岳）等；有的成了烈士；有的改正了错误，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

再来计较谁是王明宗派集团的成员，共有多少人，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反革命分子，追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甚至把遭受过王明宗派集团迫害的孙冶方同志也列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名单上面，继续加以迫害，就是一例子。本书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必要算细帐，追究个人的问题，读者不必引为遗憾。¹如果纠缠在人事问题上而不去重视历史上的政治问题，那就会失去学术研究的价值。

我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去的，在中山大学学习直到1930年夏回国工作。因此，对中山大学的斗争情况是知道一些的。我写过一篇《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登在《革命回忆录》增刊(1) (198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把知道的情况已写在此文内，现在不想重复。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感到有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这主要是：

第一，为什么王明宗派集团在中山大学中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在中国党内沿用很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表现得最为明显与广泛，后来还有人思想僵化，想用打击报复的严酷手段对待不同意见的人，这是值得研究的，对党内思想斗争应当采用怎样的正²方法必须要深入研究，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³王明的干部政策是有一定的目的与理论的，他们根本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进行残酷攻击；他们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猎取政治上领导地位，不惜无情打击干部和同他们不同意见的任何人，这是他们结成宗派小组织所

必须采取的手法。他们根本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一言堂”，强迫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反对党内的民主，使许多干部敢怒而不敢言，造成如“文化大革命”一样的灾难性运动。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损害，这个教训必须牢牢记取。研究中山大学斗争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第二，象王明等这样一些毫无革命经验的年轻人，去苏联读了一些书，就自命不凡，回国以后担负中央与各省市的主要领导责任，他们只知苏联，不知道中国的国情，搬用经典著作的若干结论，根本没有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以致中国革命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他们的许多谬论是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下进行的，至今还有人把王明等的极“左”理论视为真理。所以，还要重新解剖一下王明路线的实质，弄清楚什么是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斗争的形式究竟有哪些？可不可以同苏联一样采取镇压的方法？王明是采取“一切皆斗”，不要团结的，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讲革命是要分清阶段的，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针政策。王明路线是不讲这一套的，他们把民主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为一谈。王明在1929年12月间发表的《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文中写道：“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很明显地否定1927年底广州暴动是民主革命失败的最后一战，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式开始”。他抄袭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

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提出打倒资产阶级，打倒富农，反对中间势力的口号，使党陷于孤立，客观上是大大帮助了反革命的政治力量，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延长了22年之久。

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他在中山大学扶植王明宗派小集团，夺取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完全丧失自主的能力，坚持所谓城市暴动路线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就是意图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致到处暴动，遭到最严重的失败。他们这样是为了执行1928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指示：“党应当准备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潮，党对这新的高涨的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路线空喊革命，专门在城市组织暴动，举行工人总罢工的主要依据。因此，不可避免地使微小的党和团的组织及革命群众组织一起遭到严重的破坏，使许多同志不幸牺牲。中国革命的失败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有关，中山大学内部斗争，不是“无原则的斗争”，而是反对王明宗派小集团的专横与野心篡党的斗争。但当时大家的理论水平都很低，看不出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有一些人出于服从组织的思想盲目地跟着王明，当然为数不多。中山大学的内部斗争在“清党”以后，许多人被留在苏联，至今下落不明。有一些人是在联共后来清党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杀害了。被杀害者有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明等许多同志。根据历史的情况，现在要研究党史，我认为有必要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问题，也就

是要弄清斗争的实质问题。

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可能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意见。我希望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以充实党史的真实材料。要做好这件工作，又必须有勇气，敢于解放思想，突破框框。党的十三大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对于研究党史也同样适用。我们是多么需要把搞混乱的历史，重新加以改写。党史不能闭门造车，须要广泛征集真实的史料，这样才能把中共的党史写得生动活泼，得出历史的教训，把革命的优秀传统流传下来，以教育后一代人。

陈修良

1987年11月25日

目 录

导 论 (8)

上 篇

第一章 莫斯科中山大学简介 (13)

一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由来 (13)

二 学生的来源及各期学生情况 (20)

三 中山大学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 (30)

四 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36)

第二章 旅莫支部的成立及解散 (40)

一 旅莫支部在中山大学成立 (40)

二 旅莫支部的错误倾向及被解散 (44)

三 旅莫支部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 (52)

第三章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55)

一 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支部的建立 (55)

二 反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斗争 (60)

三 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 (66)

第四章 反对托派分子的斗争 (70)

一 中国留苏学生中托派组织的秘密形成 (70)

二 中山大学托派组织的破获 (78)

三 反对托派斗争的扩大化错误 (80)

下 篇

第五章 王明教条宗派的兴起 (89)

一	米夫与王明	(89)
二	“党务派”与“教务派”的分歧	(97)
三	王明教条宗派的兴起	(101)
第六章	抵制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	(106)
一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立	(106)
二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	(111)
三	瞿秋白等与米夫、王明教条宗派在 理论上的主要分歧	(120)
第七章	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	(130)
一	制造“工人反对派”事件	(130)
二	制造“先锋主义派”事件	(138)
三	斗争激烈的“十天大会”	(141)
第八章	严重扩大化的“清党”运动	(146)
一	“清党”运动及其扩大化错误	(146)
二	瞿秋白等同志遭受打击迫害	(151)
三	“左”倾扩大化“清党”的教训	(156)
第九章	米夫扶植王明上台夺权及反对王明 教条宗派斗争的意义	(160)
一	米夫扶植王明上台夺权	(160)
二	瞿秋白回国后继续遭受迫害	(168)
三	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斗争的意义	(171)
附录一	莫斯科中山大学大事记	(178)
附录二	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开发表的回 忆文章索引	(186)
后记		(189)

导 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爆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由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复杂使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也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19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侧面。

在中国革命史的长河中，莫斯科中山大学只是一朵浪花，它从成立到解散的五年经历，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史上也只是匆匆一瞬。但是，由于它产生于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期，生长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四方之间，因而它成为研究20年代国共两党以及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更由于远在他乡异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矛盾交错，斗争迭起，对中国革命为害极大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使它又成为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揭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产生的必经方面。不揭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史，不清楚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斗争的真实情况，就不能全面把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就无法了解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如何形成教条宗派，又怎样在共产国际的扶植下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

另外，总结“旅莫支部”的成败得失，吸取反对托派斗争扩大的教训，回顾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历史特点，实

事求是地评述广大同学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斗争的历史功过，也是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必然要求。

重要的历史阶段未必能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对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研究在国内还很薄弱。目前除当事人的回忆之外，还没有见到专门的研究文章和著述。这首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仍很难看到存在于莫斯科的档案材料。而且，由于中山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要秘密回国工作，所以不但苏联的出版物，如《真理报》几乎不报导中山大学的情况，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用中文编译出版的《国际评论》，也从不报导中山大学内部的事情。其次，中山大学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不同性质矛盾的交错，当事人政治立场的发展变化，以及当事人健在者日趋减少，都增加了研究此问题的难度，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块少有涉足的“禁区”。

实事求是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的困难，客观上为某些别有用心者的谎言提供了方便。港台及国外出版的一些有关著述和回忆传记，就有一些是利用中山大学的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诽谤和攻击。例如，曾是王明教条宗派核心人物之一，后来又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盛岳（即盛忠亮），写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本“亲身经历”。此书虽然对某些史实也有客观的介绍，但纵观全书，作者是站在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丑化和攻击，把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及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说成是“争权夺利”、“派系斗争”、“一片混乱”，故意贬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反对王明教

条宗派斗争的意义，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历史的真实面目总要被揭开，打开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块“禁区”，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自1979年起数次调查访问有关人员，并对已经发表的回忆文章和有关著述及文件材料进行了研究，从而对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愿意为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一问题尽一点微薄之力。故大胆呈此拙作，请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老同志及专家学者们不吝指教。

本书大致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主要事件为专题，以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斗争为主线，分上、下两篇，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及王明教条宗派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从而为今天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由于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误，回忆材料中的相互矛盾之处需要考证。本书除正文作了一些辨析外，附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大事记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的老同志发表的回忆文章索引，以备查阅。

上 篇



第一章 莫斯科中山大学简介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开办于俄国的为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特殊的历史年代和遥远的空间距离，不但使一般的读者对其产生了陌生的神秘感，就是那些当年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白发老人，回忆起风华正茂年代的学习往事，也带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色彩。不过，即使模糊的记忆经过相互印证也能整理出较为清晰的图象，何况历史还为我们了解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基本情况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载。因此，追溯中山大学的由来，考察学生的来源及各期学生的情况，简介中山大学的管理体制和中国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就是本章在具体评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斗争之前所要叙述的内容。

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由来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进行民主革命的产物，也是苏维埃俄国支援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成果。

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结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所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不管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①正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它必然得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大力支持，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早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列宁就兴奋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②

1912年7月，列宁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对孙中山这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提出的纲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③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特别需要得到已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维埃俄国的直接援助。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奋屡挫的逆境中，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④因而他十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632页。

^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19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2月版。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4月第1版。

^④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12卷，第6期（1935年6月）。